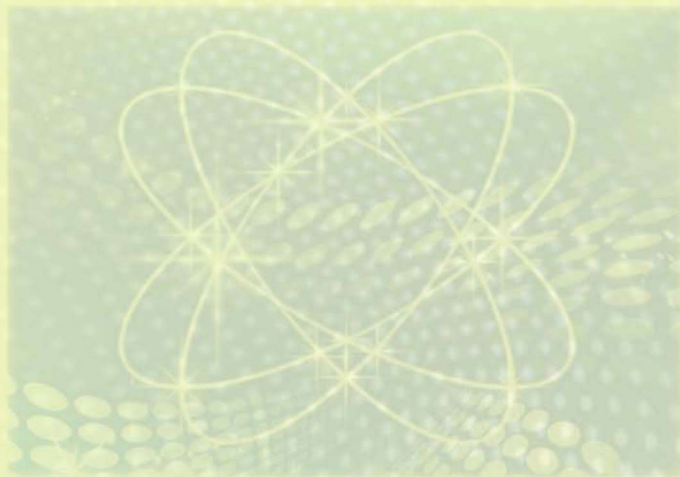


“双一流”建设中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论文集

李小萌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当代社会科学文库

“双一流”建设中的 高等教育国际化论文集

李小萌 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一流”建设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论文集 / 李小萌主编.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9
（当代社会科学文库）
ISBN 978-7-5663-1971-5

I. ①双… II. ①李… III. ①高等教育—国际化—文集 IV. ①G64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0587 号

© 2018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双一流”建设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论文集

李小萌 主编

责任编辑：王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100029
邮购电话：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010-64492342
网址：<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170mm×240mm 10 印张 153 千字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971-5

定价：40.00 元

目 录

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知识-国家-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 杨晓平 刘 阳 徐文兵 / 1	
“双一流”背景下推进高校国际化若干思考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王珊珊 / 15	
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经验对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示····· 孟 源 / 24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脉络与趋势热点分析····· 崔 丽 / 32	
对外汉语初级阶段听力课拼音教学模式浅议····· 崔艳蕾 徐 蔚 / 44	
国际课程考试对来华留学教育入学考试制度的启发····· 卢夏阳 / 52	
加快推进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实践经验为例····· 王 隽 / 60	
“双一流”背景下的来华留学生公寓经营模式初探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伍爱凤 郑书奇 / 66	
“双一流”建设中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讨 ——基于七所院校建设方案的文本分析····· 唐 灿 / 75	
开放型世界经济环境下的全球治理人才培养····· 程田玉秀 吴 倩 / 84	
英语专业（财经新闻方向）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与效果 ····· 付 涛 王 彦 / 92	
做好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助力学校“双一流”国际化建设 ——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 武子琪 / 101	
“双一流”背景下高等院校学生国际交流现状与问题分析····· 胡美雍 / 112	
高校教师公派出国的现状分析与建议····· 耿露曦 / 120	
浅析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 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化工作的影响····· 李 颉 / 128	



以服务校友为宗旨，加强校友会品牌建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校友工作及其经验借鉴……………刘金兰 / 137

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高校青年管理干部的职业生涯管理对工作水平
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北京市高等院校的调查……………耿慧芳 原馨 王春豪 / 144

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知识—国家—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

杨晓平 刘 阳 徐文兵**

摘要：运用知识—国家—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分不同历史阶段梳理国际学生的流动谱系、演进路线图与趋势，同时进一步深入探析影响国际学生流动与演进的核心要素与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国际学生流动是在学术、政府、市场、社会四种因素共同推动下形成的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进过程，四种因素对国际学生流动影响力的大小、强弱、方式既因历史时期的不同而不同，即使在同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对不同空间的国家的影响也不同，不仅存在以“知识”为起点的历时性顺序，亦存在四动力联合共同作用于同一时段的共时性特征。

关键词：国际学生流动 历史演进 动力机制 分析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

中世纪以来，国际学生的流动一直是国际间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活动的一个应然表现形式，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出不同的实然状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近十年，国际学生流动规模的剧增成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

*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一般项目“国际学生视域下北京留学教育形象研究”（项目批准号：16YJA880058）研究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杨晓平（1966—），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分党委书记，博士，研究员；刘阳（1974—），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处干部，助理研究员；徐文兵（1967—），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分党委副书记，助理研究员。



在这种历史演进的视域中，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的路线图是什么？影响其流动与演进的核心要素有哪些？这些要素是如何通过冲突与平衡作用于国际学生流动这一系统的？本文拟运用知识-国家-社会-市场的分析框架对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将国际学生的流动推移追溯至其发生的源头，将国际学生的流动置于社会演进的情景与脉络之中，旨在全面勾勒国际学生历史演进的完整图景与发展脉络，探寻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核心要素及其演进的动力机制，以期构建起能够解构国际学生流动的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特征的分析框架，从而透视国际学生流动的发展谱系、内部逻辑及其发展趋势。

二、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分析框架的理论

在早期研究文献中，国际学生流动被设定在新自由主义分析（neo-liberal frame）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被视为一种“贸易”或“流动”，西方学者趋向于孤立地研究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学生流动。在过去 10 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批评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并运用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等建构分析框架，对国际学生的流动进行解析。

2006 年，清华大学高等教育专家史静寰教授在解析布鲁贝克的“三基础模式”、伯顿·克拉克的“协调三角形”、克拉克·科尔的“对抗三角形”等经典的高等教育变迁框架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四要素环绕互动型”分析框架，将影响高等教育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力量概括为知识、国家、社会、市场四个核心要素^①。

(1) 知识。高等教育处在知识及人才生产的高端，知识、知识的丰富与积累、知识传播与再生产的需要以及知识的转型、知识在组织形态与生产形式上的变化，是影响高等教育（大学）发展的首要及核心要素。

(2) 国家（政府）。社会的演进带来知识数量、种类和形式的增加，也引起知识的结构、生产方式，甚至价值基础发生变化，近代国家的形成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生存环境，民族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成为知识服务的对象、知识发展

^① 史静寰. 构建解释高等入驻变迁的整体框架. 清华教育研究 [J]. 2006 (3): 19-25.



的新动力。

(3) 社会。社会力量既可以指有形的、不同于政府等强科层化组织的人群聚合体,如社区、社团,或特定利益群体所具有的能力与作用,也可以指无形的、由文化认知及传统习俗所产生的影响与约束力。由于社会的构成复杂,各方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尽相同,突出公平是不同人的共同呼声,平等与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关注的议题。

(4) 市场。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市场要素真正对高等教育产生实质性影响是 20 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大与政府投入不足,使大学更多依靠社会资源的支持和自身筹资、创业所得,昭示着市场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力在增强。

高等教育是由不同力量共同驱动的一个复杂的生态组织和系统,各种驱动力交错重叠,不同驱动力有不同的运动方向^①。正如史静寰教授所言,高等教育多元驱动力表现为学术力量、国家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四种力量及其所建构的体系相互对抗博弈、互动消长,呈现为差异性的张力结构形态,驱动着高等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表征为不同的表现样貌、生态特性与运行轨迹。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层次的国际学生教育同样受这四大力量的影响与驱动。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力机制

自 12 世纪高等教育产生以来,高等教育层面的国际学生流动的演进大体可划分为初步形成阶段、重启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四个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知识、政治、市场、社会等差异化的驱动背景,国际学生的流动也显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与实然形态。

(一) 国际学生流动的初步形成(中世纪—16 世纪末)

在国际视域中,国际学生流动具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① 李泉鹰. 论大学、政府、市场的权力生态关系.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J]. 2009 (6): 26-30.



前 300 年希腊学者赴亚历山大深造，以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①，古埃及、古罗马跨国界的“游教”和“游学”也是早期国际学生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高等教育层次的国际学生流动是随着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与发展而逐渐演进的。12 世纪，意大利的波轮亚大学和萨勒诺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比利埃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先后成立，科学意义上的大学这一组织形式在欧洲大陆诞生。

从诞生之日起，基于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的理念，大学就以知识与学问为最高追求，向不同政治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开放，师生四海求学，平等互助，“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从勃隆那到巴黎，从巴黎到牛津，在同一的上帝的世界里，甲大学的学者可以受到千里外他国乙大学学者的款待，论共通的书，谈共通的问题，宾至如归”^③。

涂尔干认为，“整体而言，中世纪的学校都具有一种跨国的特点”^④，并且指出，“巴黎学校这个方面尤为突出。巴黎学校不属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而是属于整个基督教世界。老师和学生来自各地，不分民族，共同组成了这所学校。不仅如此，在 13 世纪早期，在法国巴黎授予的学位就得到欧洲所有国家的承认。在巴黎获得执教权不仅可以沿用到整个法国，而且人们一旦获此执教权就可以享有在任何地方执教的权力。在巴黎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被视为从整个教会拿到的博士学位。因此，它可以说是某种世界主义的自然后果”^⑤。据统计，“对 13 至 14 世纪在巴黎大学求学的外国著名人士进行了详细研究，结果发现，其中有英国人 153 名，德国人 200 名，荷兰人 86 名，意大利人 109 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 44 名，斯堪的那维亚人 41 名，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希腊人共 41 名，稍晚还有来自亚洲的学者，而且在校长名单中还有外国人”^⑥。

中世纪大学的这种国际品质与世界精神使高等教育成为一项国际性的事

① Jalowiecki, B., & Gorzelak, G. J. (2004). Brain drain, brain gain, and mobility: Theories and prospective methods.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9, 299-308. doi: 10.1080/0379772042000331589.

② 陈学飞. 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历史到理论到策略. 上海高教研究 [J]. 1997 (11): 57-61.

③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M]. 2001: 201

④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李康,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⑤ 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 [M]. 李康,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⑥ 陈学飞. 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历史到理论到策略. 上海高教研究 [J]. 1997 (11): 57-61.



业^①，探索真理、发现知识、生产知识、分享知识是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最为重要的驱动力。

进入 16 世纪，欧洲各国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各地新教派崛起，世俗王权不断加强，民族国家逐渐建立，大学被各国新教贴了不同的标签，赋予了不同的国家使命，“大学跨疆域的特性逐渐被国家间的藩篱所取代，大学的国际化不再被强调”^②。

随着欧洲大学规模的增加，大学的区域性特征逐渐凸显，学生就近入学的趋势渐增，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大为萎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力量的介入，许多欧洲国家颁布了相关法令和条例，规定禁止本国学生到外国留学，某些职位须由特定大学的毕业生担任，以此来保护本国大学的利益。中世纪欧洲大学的“国际品质”逐渐弱化，知识普遍性的观念和大学的世界品质遭到严重冲击，国际学生流动的动力机制受到严重阻滞。

在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如下特征：

(1) 对知识的追求，成为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后期随着民族国家力量的兴起，国家力量对高等教育的介入，知识因素与国家因素的对抗与博弈，则构成这一阶段国际学生流动生态环境转换的主要特征与内部逻辑，市场、社会与文化等因素为不显著的驱动因素。

(2) 国际学生流动流量规模较小，流向呈现垂直流动，即主要由高等教育水平较低的区域向较高水平（知识丰富与集聚）的区域流动，流动的区域范围较小，学生流动主要限于欧洲本土。

(3) 国际学生流动的形式较为单一，流动主要是学生个体自觉自发的行为，而非由政府与大学有设计的、有组织的国际流动。

（二）国际学生流动的重启（17—19 世纪末）

知识是高等学校最为重要的一个内核，生产知识、传播知识、追求真理与自由是高等学校最为本质的职能，大学作为一个自由流动的知识资本的角色，

^① 王英杰,高益民.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21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课题.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J] 2000 (2): 13-10, 21.

^② 萧霖. 大学国际化指标建构与运用之研究 [M]. 台北: “国立”教育资料馆, 2006.



其自身的逻辑是大学发展始终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17 世纪伴随着现代大学的兴起，知识的追求重新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主要内驱力，追求真理、探求知识的科学精神重新扬起。16 世纪末开始的德国大学的改革催生了现代大学的发源。

中世纪后期，德国大学随整个欧洲陷入危机之中，甚至成为“腐朽与落后”的标志。在此期间，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德国分别于 1694 年、1737 年创办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秉持现代科学和哲学，鼓励学术自由与学术探索，特别是哥廷根大学延聘他国知名教授，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吸引大批显要人物和国际学生，哥廷根大学被众多学者冠为欧洲的“第一所现代大学”^①。

德国于 1810 年创办柏林大学，提倡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育和科研结合的理念，改造德国高等教育，并坚持开放办学，面向全欧洲招聘教师，极大提高了德国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水平，促进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法、英向德国的转移，使其成为当时世界科学研究的中心。在 19 世纪前后，美国约有一万名学生赴欧洲大陆来德国高校留学学习，德国也有近三百名教授和学者远赴美国高校教学。同时，欧洲其他各国到德国留学的国际学生规模急剧增加，德国大学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圣地。

这一时期，在国际学生流动的演进过程中，除了知识因素这一驱动力之外，国家维度的驱动力继续加强，其表现在两个向度：第一，继续加强对本国高等教育的渗入与控制，比如德国政府以提供经费、保证大学教学自由的方式，使大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国家目标，大学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使这一知识共同体组织与系统既要追求知识与教学自由，又要服务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与需要，大学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改变。

第二，表现为殖民国家的兴起与殖民教育的扩张。17 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殖民主义开始扩张。为实现瓜分世界的政治欲望与诉求，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和美国等欧美殖民宗主国强行在其殖民地国家开办新大学或设立海外分校，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与需要的高等教育系统与体系，输出其高等教

^① 李雪飞. 世界精神的嬗变与追求: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思索. 黑龙江高教研究[J] 2005(12): 14-16.



育制度和模式，如英国建立的塞拉利昂的弗拉湾学院（1827年），加拿大的拉瓦尔大学（1852年），印度的孟买大学、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大学（1857年），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旁遮普大学（1882年），印度的阿拉哈巴德大学（1887年）等^①。同时，帝国政府也秉持这种假设，即被殖民国家的精英人才在帝国留学，掌握技能，并且吸收了殖民统治者的价值观以后，返回国土为殖民政府服务。因此，西方殖民国家常用来提供途径，选拔被殖民国家的人才在帝都攻读高等教育，在殖民地发展支持性的行政管理人员。在殖民统治时期的殖民教育服务于双重作用，即“有效管理和社会控制工具”^②。

总之，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跨境流动的一种早期形式，西方国家创办的殖民地学院和大学，以及教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种教会学校，成为促进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与推动力量。

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呈现如下阶段性特点：

（1）知识维度与国家维度的驱动力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不是单一的对抗与冲突的博弈关系，而是呈现出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的交互模式。政府是大学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指导者，16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兴起、殖民国家的发展，国家和政府经常通过立法或政策冲击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内在逻辑，影响或干预大学的办学与改革，国家成为影响大学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外部力量，国家维度的驱动力也成为左右国际学生流动的流向、流量等一个重要的外部驱动力量。

（2）国际学生流动的流量、流向与流动区域显著扩大，参与国际学生流动的国家及其学生大大增加，从欧洲内部延展到世界各地，教育知识与信息从殖民国家流向被殖民地国家，仍呈现垂直流动的性质。

（3）学生流动的形式不仅仅是学生个体自发的行为，也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方式，国家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开始成为其重要的一个推手与驱动力。

^① 全球大学创新联盟. 2007年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M]. 汪利兵，阚阅，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29.

^② Goodwin, C. D. (Ed.). 1993.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overseas education for development.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初步发展（20世纪初—80年代）

20世纪初至二战前后，总体而言，国际教育与学术交流主要以学者的流动为主，国际学生的流动仍主要是被殖民国家流向欧美殖民宗主国、社会主义国家流向苏联，以及北美和西欧之间的流动。

二战后，高等教育层面国际学生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实然样态。被殖民国家纷纷独立，民族国家及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世界各国战后的重建，使各国政府逐渐认知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为阻滞其国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在此大背景下，人力资源开发和高等教育投资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知识，促进国际学生的流动，成为“边缘”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战略。

同时，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争霸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通过教育输出、教育援助等方式，通过推动国际学生的流动，输出本国的政治、文化理念以及政治和文化价值，增强其全球影响力。国际学生教育成为两霸扩张影响和争夺势力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家维度的驱动力量成为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显著因素。

同期，美国政府先后颁布《富布莱特法案》《国防教育法》与《国外援助法》等法律制度，设立个人奖学金，资助国际学生与学者的国际交流，支持现代外语的教学和地区研究，并视高等教育机构为对外援助和渗透的一个重要载体。1951年起，美国开始教育援助活动，18年间共为75个国家的1.1万名各类人员提供了教育，大量援外人员也被派遣赴发展中国家工作^①。

同时，苏联政府也通过教育援助、教育输出等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者邀请其专家和学者来国内学习和工作。60年代后半期，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每年约有1.6万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学习^②。

从本质而言，美国和苏联两国高等教育层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援助和文化交流的项目由政府控管，经费由政府提供，这些项目均成为外交政策的

^① 顾建新. 跨国教育发展理念与策略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8: 110.

^② Phillips, H. M.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 1976.



工具。

其他发达国家也着力开展国际教育援助活动，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政治影响。澳大利亚于 1951 年开启“科伦坡计划”，对南亚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支持，资助这些国家的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这项计划成为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73 年，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 16 个发达国家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9.8 万多份留学生奖学金，并派遣 3.6 万名教师和专家^①。此外，发达国家还通过世界银行、原欧洲共同体等机构来筹措教育经费，援助国际学生流动。

从个体而言，许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为了追求知识与专业，为将来更大的发展预期，个人自费投资赴发达国家海外留学。

这一时期的国际学生的结构更加复杂，从资金来源方面可以分为五类：

(1) 前帝国政府资助的国际学生，如被殖民国家的学生赴帝国首都或大城市留学，如伦敦和巴黎。

(2) 冷战对手资助的国际学生。美国与苏联通过法制制度或奖学金等手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

(3) 由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机构资助的国际学生。比如：世界银行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赞助商。

(4) 由国家政府资金资助的国际学生。许多国家在独立后的时期推出留学奖学金项目。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人出国研究领域涉及农业、商业、工程、科学和技术。

(5) 私人资金。个人自费也是很多学生资金来源的一种形式。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自费比现在更容易，大学不征收任何学费费用。然而，在这个时期海外留学项目大量是捐助者资助的。

国际学生流动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经合组织）国家、殖民列强或冷战的盟友，主要表现为垂流流动，也有少量的平等流动，即发达国家一些学生赴发展中国家留学，主要为获取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文化。几个发展中国家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生的目标国，埃及、印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是共同

^① Phillips, H. M.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 1976.



的目标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更加发达和更广泛的高等教育网络，而且高等教育学费是免费的，生活费用非常低。

总之，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学生流动呈现以下特点：

(1) 国家维度的驱动力是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动力，国家和政府组织在国际交流合作与国际学生流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推动国际学生流动的主体与主要驱动力。与国家维度的驱动力相比较，国际学生个体对知识与技术的追求（知识维度）以及跨文化的体验驱动力较弱，知识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的驱动力在此阶段国际学生流动中处于从属的地位。

(2) 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而且结构多样化。在国际学生流动中，国际学生的主要流向为美国、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

(3) 国际学生的流动发展迅速，项目流动的国际学生教育新形式已经出现，已经从以前的零星的、个别的性质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项目和计划。

(四) 国际学生流动的蓬勃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福利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全面萎缩，西方新管理主义思想与市场经济话语逐渐成为权威话语，大学这一组织机构的外部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学与国家、市场与社会文化正在形成新的多元的关系框架。在这一宏观场域中，大学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存图景逐渐变化，国际学生流动的驱动力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结构与矩阵模式。

在这一新型的关系结构与模式中，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市场化改革逐渐消减大学作为一个知识共同体的自治系统的传统理念，也迫使政府反思并建构新的治理机制与模式，开始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如：契约、自我管理、评估制度等，逐渐彰显市场的规则与逻辑，市场反应模式成为高等教育运行的一个重要特色。满足消费者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事项，学生与家长可以自由地在全球性的市场中选择他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学校与课程。

1973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援助政策，对国际学生实行收费政策，弥补高等教育办学经费的不足，努力解决政府削减公共



教育经费而造成的困境。同时，国际组织也开始重视发展国际学生教育的经济学意义，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将教育服务纳入服务贸易的范围，扩大国际学生教育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

1980年，英国政府大幅度削减中央政府对教育的拨款，率先推出了国际学生“全额成本学费”政策。随后，澳大利亚也开始缩减高等教育财政，1988年提出了“高等教育贡献方案”，决定对留学生收取比国内（或定居）学生更高的学费。

发展国际学生教育成为了发达国家摆脱高等教育财政危机的重要手段，经济与市场维度的驱动力成为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

国际学生的流动及其教育为国际学生目的国产生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据统计，2008年澳大利亚教育部门的总收入合计为166亿澳元，仅低于重工业部门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率，其中来自国际学生教育的收入额为95亿澳元^①，成为教育收入与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0年，澳大利亚国民经济总增长的44%来自教育^②，国际学生教育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产业^③。高等教育业已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服务出口产品。2010—2011年度，美国高校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共计为143亿美元，加之各种相关的生活支出，国际学生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贡献额度达到202亿美元^④。

在市场力量逐渐成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驱动力的同时，另外一种驱动力也开始逐渐形成，并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显性驱动力量，即社会文化的驱动力量。

二战以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贸易、消费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大。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加广泛和深入，文化的碰撞和文化价值的冲突也相伴而生，文化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比较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教育竞争力报告·2010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② 张秀琴, 何天淳. 东亚峰会框架下的高等教育合作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1.

③ 王哲. 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北方经济 [J]. 2011 (3): 29-31.

④ 柯进, 张以瑾, 高毅哲.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 鼓励民办高校参与教育服务贸易竞争 [N/OL]. 中国教育报, 2012-03-07 (01).



的多样性与交互性是这个世界的—个基本特征。

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多样化发展趋势要求高等教育关注跨文化教育，提高学生适应能力和发展能力，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正确审视本土的文化，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当今世界，发展跨文化教育已成为国际教育组织、区域经济共同体、世界各国，以及世界一流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个重要教育理念与—项教育策略。

1980年联合国“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开始关注并倡导跨文化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出台《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等系列文件，倡导文化教育要“促进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及增强理解可以确认的不同团体的文化”，“其目的应是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①在实践层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学生、教师、研究人员等人员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加强现代外语的学习，促进国与国之间共同感兴趣的教育和文化计划。

在这一阶段中，另—个驱动力——学术力量在全球知识服务领域的竞争中日益向市场力量靠近，学术力量在国际学生流动中的作用及影响力相对消减。虽然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要求大学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作为社会大组织中的—个亚组织形式，大学从来都不是—个自我支持的组织，而是不断与外部组织交互作用，调节并变更自身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当下，高等教育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趋于社会的中心，现代大学既遵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兼顾社会的需求，在自身逻辑和外部需求的对抗中寻找平衡。

在当下知识经济社会中，学术权力为证明其在经济价值方面的能力，逐渐向市场靠近，以进一步证明并稳固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知识的探索与传播活动中获得经济价值成为全球高等教育—个普遍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世界很多国家政府的权力呈现出减弱的趋势，政府已逐步由以往的主导管控的角色向引导监督的角色转变，其作用不再是直接决定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而是着力于建立和完善教育市场、调控教育市场，由控制转向引导，政府的权力部分地让渡给市场。

^① 赵中建. 全球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 国际教育大会60年建议书[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